



【中国观察之邵建专栏】

## 私人生活要“自由” 公共生活要“民主”

北京酒仙桥地区危改拆迁用民主投票的方式来作决定,结果已经揭晓,只有占居民总数 44.78%的人同意按现有方案进行危改(6月10日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昨天下午和朋友喝茶时聊起此事,其中一位表示认同,认为用民主的方式要比行政强制好得多。我当时就表示反对,记得我表达的意思是:民主只是针对公共领域而言,不能用在拆迁之类涉及私人权利的事务上。至于媒体所谓的“拆迁民主”显然是把民主用错了地方,这不啻于误导民主。

前不久有篇文章题名“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必须警惕,民主也可能是个坏东西。这里的好与坏,不在于民主本身的真与伪,而在于你把民主用在了什么地方。中国古语“橘逾淮则为枳”,拆迁民主即为一例。民主不是无边的,而是有限的。说拆迁民主是坏的,坏就坏在此地根本就不能启用民主。一旦启用,则不免这样的情况,即一些人利用投票的机会公然侵害或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这种情况如果发生,所谓民主便成了“多数人的暴政”。

为什么“拆迁民主”是坏民主?这要从一个人的生活和生活中的权利说起。任何一个人来到世上,他既是一个自然人,又是一个社会人。作为自

然人,他有他的一系列的自然权利,比如生命权、财产权、迁徙权、信仰或不信仰的权利等。作为一个社会人,他也有他的一系列的权利,比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弹劾权等,这些权利往往是通过投票的方式而实现。根据上述权利,一个人的生活由此形成既有联系又有分殊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自然权利”为主的私人生活,一方面是以“社会权利”为主的公共生活。这两个不同层面的生活,有着不尽相同的游戏规则。在私人生活领域,不存在民主不民主的问题,只存在一个“自由”的问题,而自由则表现为权利不受强制的状态。在公共生活领域,才有所谓的民主的问题,它表现为公民对私人生活以外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投票的权利。

就这两个领域而言,私人生活要“自由”,公共生活要“民主”。这意味着民主是有边界的,它不能越过公共领域而往私人领域延伸。一旦延伸,私人领域中的权利势必遭受破坏。私人生活中的权利是自然权利,它是上天赋予的,西方人惯称为“天赋人权”。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间的力量包括民主的力量都没有理由去侵害,除了它先行侵害他人的权利外,很难想象,在私人生活中,我

们居然可以通过投票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他的信仰或他的财产。而“拆迁民主”所以危险,就在于它所触碰的正是私人财产权和迁徙权的禁区,试问,他人有什么权力以投票来剥夺那些产权者对自己财产的处分的权利呢?有似“拆迁民主”之类的坏民主,还可以再举,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饮鸩而死,他就死于广场上的投票民主。理由之一却是他不信城邦的神并向年轻人鼓吹新神。因个人信仰而判处死刑,这样的民主是真的,也是嗜血的。相似的例子还有后来的法国大革命。

也许我们应该形成一个共识:就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而言,自由的自由,民主的归民主。就自由和民主的关系而言,自由比民主更重要,民主是为自由服务的。就酒仙桥地区的民主而言,民主不能用在拆迁上,倒应该用在那位代表酒仙桥街道发言的权力人身上,即他的权力应当是选票选出来的,而不是他的上级任命的。对权力进行选举才是公共领域中的问题,民主如果不是针对权力而是针对权利,是所谓错用民主。错用民主实乃既害民主又害民,为民主鼓吹者则不可不察。

(作者邵建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中国观察之乐毅专栏】

## 其实芙蓉姐姐也可以演林妹妹

我们夷平高山、砍光丛林、填平沼泽,让河流改道,重建城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您在这个国家拥有一个更便捷的营商环境!——这是当年菲律宾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在美国《财富》杂志上做的广告。我在这里引用它,不是想讨论其对错得失,只是因为觉得它非常生动地展示了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资本为王。

“红楼梦中人”选秀结束,导演胡玫宣布:李旭丹、姚笛将分饰黛玉、宝钗,宝玉的人选待定。新版五十集《红楼梦》连续剧将于今年十月开始拍摄,明年奥运会期间与观众见面(央视国际6月11日)。一切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了。为期十个月的红楼选秀,各式各样的新闻、传闻之多,多到可以用“不堪”两字来形容。其内幕、黑幕之重重真是让人雾里看花,头晕眼花。也许唯有借到“资本为王”这双慧眼,才能把这份扰扰看个明白。

其实,红楼选秀刚开始时,我和一些网上结识的红楼朋友都认为,选秀不过乃一噱头,新版《红楼》是不可能使用选秀胜者出演主角的,至多给个丫头之类的角色罢了。因为短信投票这种一小撮粉丝狂热的伪民主方式,能选得出什么好鸟?但事

实证明,我们这些家伙真是读书读到脑袋锈透了,根本就没有明白“资本为王”的游戏规则。新版《红楼》首先是一件商品,它之首重者,自然是成本与回报。

选秀,既可以先挣一把选手与粉丝们的钱,又可以省下请大牌演员的片酬。而且,拿着选秀过程中的新闻、传闻、丑闻一通爆炒,如,50岁大姐为了竞选“宝钗”,花费15万元整容十余项;选手持刀威胁评委……吸引大量眼球,又可以省下一大笔宣传费。如此一举数得的美事,资方怎么会不热衷呢?

唯一令资方麻烦的也许只有导演了,因为片子拍得太难看还是会影响到生意的,所以虽可以不请大牌演员,但好导演还是要请一个的。而导演总是想从艺术上掌控片子的,因为拍砸了坏的是导演的声誉。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传闻”:导演胡玫从一开始就不赞成通过选秀挑主角,而后又公开对晋级选手表示不满,最后以摆挑子相威胁。终于,她唯一勉强看中的“黛玉”人选×××成功复活,并最终拿到冠军。

这似乎是资本的权威被导演的话语权挑战了。但其实,我们应当看到,这只是导演权力重大溃败后的一次小规模反攻。以往,一般是导演

选择演员以后,再与资方商量,第一轮选择权在导演手中。而这次,则是资方选择演员后再与导演商量,第一轮选择权转到资方手中了。资方为了保证利润,随后作出了一定的妥协,这其实仍是“资本为王”的一贯游戏规则。“资本为王”不是革命,它追求的是和平演变。

在整个事件中最悲惨的,就是三个“宝玉”了。他们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最终白忙一场,被人当猴子耍了一回。在与胡玫PK时,资方之一的北京电视台曾态度强硬地表示:新版《红楼梦》必须认可红楼选秀的结果,并用其做剧中主要演员。否则,中影集团、华录百纳将承担一切法律后果。但现在这个“让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估计他们也就“灵活”了吧。三位“宝玉”会不会再有抗争行为,我不敢预估。但以他们与资方力量的悬殊,大局估计也就这样了。在这个“资本为王”的时代,人,不过就是资本的玩偶罢了。

其实,芙蓉姐姐也是可以出演林妹妹的,只要她能给资本带来比别人更大的利润。那时候,别说是胡玫反对了,就算是九泉之下的曹雪芹大声抗议,恐怕也是没有用的。

(作者乐毅系自由撰稿人)

## 两千多万赞助费呢,不用审计了?

■今日视点

全国牙防组是搞牙膏功效认证的,现在对牙防组问题的彻查倒也像挤牙膏一样,生怕挤得太多容易出事。6月11日的《中国网》报道说,卫生部当天公布了牙防组审计结果及处理意见。卫生部的审计结果认定,1997年~2006年,牙防组违规收取“认证”收入208.5万元。处理结果是:“认证”收入全部上交,卫生部还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果然不出所料——卫生部打在牙防组身上的板子是“高高提起,轻轻放下”。记得5月21日卫生部《关于全国牙防组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中已经提到,从1997年到2006年,牙防组累计收入2769.76万元,除了认证收入,还包括赞助费2068.61万元,会议收入359.76万元等。(5月22日《京华时报》)

现在审计结果在舆论的千呼万唤下终于给挤出来了,却只是提到208.5万元的违规认证收入,而数额庞大得多的2068.61万元赞助费卫生部却绝口不提,真是咄咄怪事。不过这事说怪也不怪,中国人不是有句俗语叫“老子打儿子”吗,卫生部的所谓审计结果正给我们上演了这样一出好戏——众所周知,卫生部是牙防组的主管部门,当然跟牙防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牙防组的问题定性得越轻,卫生部承担的管理责任也就越小。正是在这样一种“老子护儿子”的心态下,卫生部才“积极”地组织人员审计牙防组的问题,并且多次向舆论表态:牙防组是有过很大贡献的。到了现在,审计结果出来了,卫生部不仅绝口不提自身的管理责任,而且把牙防组多年来收取的几千万赞助费“雪藏”了起来,只是拿两百多万的违规认证费

用来说事,真是“用心良苦”啊。

从责任关联角度来看,卫生部和其主管的牙防组已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从卫生部声称要审计牙防组财务问题的时候,我就没对这个审计结果抱什么希望——老子审儿子,再怎么审都不会伤筋动骨的,况且一着不慎很可能把自己给扯进去。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卫生部的审计结果居然能够绝口不提牙防组收的几千万赞助费。这个让人在意料中失望的审计结果再次告诉我们:把责任追究寄希望于“老子打儿子”这样的模式上,我们收获的将注定是失望。

和牙防组一样“权威”但却非法的认证机构全国有很多,这些机构的主管部门门头也很大。牙防组的问题最终如何收场,不仅我们在看着,这些问题认证机构同样也在看。如果牙防组的问题最终只有一个飘飘

的处理结果,这些机构必将放下心里的大石,接过牙防组“非法认证”的大旗,前几天就有报道说,牙防组被取消后,中华口腔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等机构依然出现在牙膏产品的“证言式”广告中,原牙防组的副组长、会员已经重新“上岗”,成了上述两家学会的重要成员甚至领导。

我始终认为,要想彻查揭穿牙防组的认证黑幕,就应该导入审查利益回避机制——作为主管部门的卫生部,不仅不能对牙防组进行“内部审查”,更应该及时回避,请国家审计署或其他的中立调查机构彻查牙防组的问题。唯有如此,审计才能显示出应有的公信力,牙防组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才会无所遁形。但现在看来,卫生部显然希望牙防组事件自己能够“一切尽在掌握”,这样的姿态,实在是比牙防组忽悠全国人民更大的悲哀。(陈强)

## 禁令越细就越接近于作秀

■公民发言

《海南日报》6月11日报道,机关工作人员上班期间如有在办公室用餐、吃零食、用办公室电话聊天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将受到处罚。这是浙江省瑞安市日前作出的新规定。

猛然间,我发现各地党政机关出台的越来越细的趋势。比如,前段时间股市牛气冲天,很多地方就发了“禁止上班时间炒股”的规定。现在,瑞安市连“不准在办公室吃零食”都作出了规定。这样的“流行风”让人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禁令是不是越细越好?

禁令越细,当然就越有针对性,但作为在一个系统内具有普适性的禁令,它更应该管理“某一类行为”而不是“某一类行为”。比如,影响机关形象、

妨碍办事效率的行为,可以在总体上列为禁止对象;而具体的上班时吃零食、煲电话粥、炒股,则没有必要单列出来。试想,你禁止在办公室用餐、吃零食、用办公室电话聊天,那你是否能把其他上班“异行”也全部列进去:看小说、练书法、织毛衣、修指甲、玩游戏、听歌曲、打太极、掏耳朵……就算你想列,那也是力所不能及。

既然如此,禁令越来越细为什么还会成为“流行风”呢?其实,这折射了一个现实——我们的监督管理长期不到位,在碰到具体问题时,就“发明”越来越细的有具体针对性的禁令,希望以此提醒工作人员“自律”。其实禁令越细,往往就越接近于作秀。假如各地乐此不疲,那将是更令人忧心的一股“流行风”。(李知雅)

## 名人作文是去掉锁链的狂欢

■异论锋生

高考过后,芙蓉姐姐、宋祖德、何洁以及网络小胖等7位话题名人一起写了天津的高考作文《有句话常挂在嘴边》。一刹那间,各路豪杰纷纷参与,给名人投票、回帖评论,短短两天里,小规模地制造了一场狂欢的文字Party。

(《新快报》6月11日) 高考作文之于考生们是“带着镣铐跳舞”,之于各路明星们却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无论是芙蓉姐姐的《芙蓉姐姐无敌》、宋祖德的《虚伪》,还是网络小胖的《天生我胖必有用》、何洁的《我要减肥》,皆以其夸张的修辞、叛逆的姿态、狂放的自由放逐了“高考”,还原了“作文”。他们告诉我们,原来高考作文也可以这样写。

不管各路明星们的高考作文何其粗陋、何其“侮辱了高中生的智商”,其对于传统高考作

文写作范式的冲击都是颠覆性的。这分明是一种失去“枷锁”之后的自由写作,无需字斟句酌、无需牵强附会,更无需证明自己多么高尚、多么乖巧,写作就是写作,它的本质就是极其私人性的,意至笔随、洋洋洒洒、一挥而就。

对于这场“哄客时代”的自娱自乐游戏,可能当事者谁都不太当回事,但在我看来,明星作文及其引发的盛大狂欢,并不亚于一场重大的“文化事变”。它以某种游戏精神和功利取向不期然中挖了正统高考作文的墙脚,确立了个人的主体性,撒播了“我手写我心”的种子。而这对于那些总想着文以载道、总想着为时代做注脚的高考命题者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压力,以促使他们尽早把高考作文从“国家”“时代”“民族”这些大词中解放出来,还它的私人性和纯粹性。(张强)

## 有不浪费的政府,才有节约型社会

■热点纵论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近日完成的一项读者调查显示,83%的人认为整个中国社会浪费现象越来越严重,90.3%的人认为政府的浪费现象比个人更严重。(《中国青年报》6月11日) 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显然,政府作为社会风气的引导者,它也应该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主导者。时下,有些地方尽管穷得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仍然举债为文艺演出,公款追星;近年来,尽管油价飞涨,

资源紧缺,可是,小排量汽车仍然很难挤进政府的采购大门;而那些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无疑更是在给奢侈的社会风气推波助澜。行政部门从经济增量中拿走太多,势必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谓“不正己身,何以正人”,政府如若不从自身做起,“节约型社会”就不可能有实现的一天。

要有节约型社会,首先要有节约型政府。建设节约型社会,这不仅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考验,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现在一场“绿色浪潮”正席卷全球,一

些绿色政党、绿色政府相继崛起。以德国执政党联盟之一的“绿党”为例,他们就制定了一个“绿色政治纲领”:即生态学、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和非暴力。他们强调世界的整体联系和统一,强调生态平衡的伦理意义,指出单靠效用、生产率、国民生产总值去衡量进步,不考虑社会、生态背景,只能导致灾难。这两年来,“可持续发展”作为政府倡导的重要内容而被广泛讨论,这说明决

策者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虽然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但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开始。

胡锦涛强调“节约能源资源,政府要先行一步”。节约,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不仅是出于财政的考虑,也是一种治国之道,直接影响着干群关系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要把节约型社会落到实处,一些政府部门就应摒弃奢侈浪费的陋习,给社会、公众做出表率。(林金芳)